

## 《过秦论》三题\*

刘跃进

摘要:关于西汉贾谊名篇《过秦论》有三个问题:一是《文选》所收《过秦论》的文本来源问题。经考察具体文本可知,《文选》中所收《过秦论》的文本来源,可以肯定不是来自《新书》,而是来自《史记》或者《汉书》。二是关于《过秦论》之“过”字的内涵问题。三是《过秦论》的思想与写作对于后世史论文章的意义与影响。

关键词:贾谊;过秦;曹冏;干宝;新书

DOI: 10.13471/j.cnki.jsysusse.2016.02.001

贾谊所撰《过秦论》是一代经典名篇,过去的研究,针对它独特的文体、成为经典的过程等问题,已经有过较多的着墨。学无止境,重读《过秦论》,本文想在三个方面提出一些讨论意见。首先,从文本本身出发,考察《文选》所收《过秦论》的文本来源为何。其次,《过秦论》之“过”字的内涵以及它的警示意义。再次,联系汉初的历史实际情况,讨论《过秦论》的历史意义和影响。

### 一、《过秦论》的分篇缀合

《过秦论》这篇文章,在汉代就已经受到充分的重视,颇获征引。《史记》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与《陈涉世家》两篇却取贾谊《过秦论》为“赞”文,以之为对秦朝的正统评价,而不是以“太史公曰”来作为议论收束,颇有将之作为历史定论之意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同样引用了《过秦论》为史论,并表彰贾谊的“过秦”具有“暴秦之戒,三代是据”<sup>①</sup>的地位。虽然各家对《过秦论》都给予了很高评价,但是,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及与流传于后世的贾谊《新书》,对《过秦论》的过录,分篇不同,文字也多有差异。《过秦论》为《文选》收录于卷51“论”首之后,影响很大。后世所传之《过秦论》,颇以《文选》所收之篇为依据。那么需要分辨的是,《文选》究竟是以贾谊《新书》还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所过录之《过秦论》为底本的呢?针对这个问题,首先需要来分析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关于《过秦论》的引录。

(一)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“太史公曰:秦之先伯翳,尝有助于唐虞之际,受土赐姓。及殷夏之间微散。至周之衰,秦兴,居于西垂。自缪公以来,稍蚕食诸侯,竟成始皇。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,地广三王,而羞与之侔。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!”<sup>②</sup>下亦引有《过秦论》:

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,缮津关,据险塞,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,奋臂大呼,不用弓戟之兵,鉏耰白梃,望屋而食,横行天下。秦人阻险不守,关梁不阖,长戟不刺,强弩不射。楚师深入,战于鸿门,曾无藩篱之艰。于是山东大扰,诸侯并起,豪俊相立。秦使章邯将而东征,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,以谋其上。群臣之不信,可见于此矣。子婴立,遂不寤。藉使子婴

\* 收稿日期:2015—09—02

作者简介:刘跃进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(北京100732)。

① 班固《汉书》卷100下叙传第70下,北京:中华书局,1962年,第4252页。

②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6《秦始皇本纪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14年,第349页。

有庸主之材,仅得中佐,山东虽乱,秦之地可全而有,宗庙之祀未当绝也。

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,四塞之国也。自繆公以来,至于秦王,二十余君,常为诸侯雄。岂世世贤哉?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。当此之世,贤智并列,良将行其师,贤相通其谋,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,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,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。岂勇力智慧不足哉?形不利,势不便也。秦小邑并大城,守险塞而军,高垒毋战,闭关据阨,荷戟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,以利合,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,其下未附,名为亡秦,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也,必退师。安土息民,以待其敝,收弱扶罢,以令大国之君,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而身为禽者,其救败非也。

秦王足己不问,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,因而不改,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,危弱无辅。三主惑而终身不悟,亡,不亦宜乎?当此时也,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,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,秦俗多忌讳之禁,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,倾耳而听,重足而立,钳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,忠臣不敢谏,智士不敢谋,天下已乱,奸不上闻,岂不哀哉!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,故置公卿大夫士,以饰法设刑,而天下治。其强也,禁暴诛乱而天下服。其弱也,五伯征而诸侯从。其削也,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,繁法严刑而天下振;及其衰也,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。故周五序得其道,而千余岁不绝。秦本末并失,故不长久。由此观之,安危之统相去远矣。野谚曰“前事之不忘,后事之师也”。是以君子为国,观之上古,验之当世,参以人事,察盛衰之理,审权势之宜,去就有序,变化有时,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。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而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备,外连衡而斗诸侯,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,惠王、武王蒙故业,因遗策,南兼汉中,西举巴、蜀,东割膏腴之地,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,会盟而谋弱秦,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,以致天下之士,合从缔交,相与为一。当是时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,皆明知而忠信,宽厚而爱人,尊贤重士,约从离衡,并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,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昭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,吴起、孙臆、带佗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,百万之众,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,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,争割地而奉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敝,追亡逐北,伏尸百万,流血漂鹵。因利乘便,宰割天下,分裂河山,强国请服,弱国入朝。延及孝文王、庄襄王,享国日浅,国家无事。

及至秦王,续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捶拊以鞭笞天下,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,百越之君俛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。堕名城,杀豪俊,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,销锋铸鐻,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后斩华为城,因河为津,据亿丈之城,临不测之溪以为固。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,天下以定。秦王之心,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秦王既没,余威振于殊俗。陈涉,瓮牖绳枢之子,氓隶之人,而迁徙之徒,才能不及中人,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,陶朱、猗顿之富,蹊足行伍之闲,而倔起什伯之中,率罢散之卒,将数百之众,而转攻秦。斩木为兵,揭竿为旗,天下云集响应,赢粮而景从,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,雍州之地,殽函之固自若也。陈涉之位,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;鉏耰棘矜,非铍于句戟长铙也;适戍之众,非抗于九国之师;深谋远虑,行军用兵之道,非及乡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,功业相反也。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,比权量力,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,千乘之权,招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,殽函为

宫,一夫作难而七庙堕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秦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,天下之士斐然乡风,若是者何也?曰:近古之无王者久矣。周室卑微,五霸既殁,令不行于天下,是以诸侯力政,强侵弱,众暴寡,兵革不休,士民罢敝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,是上有天子也。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,莫不虚心而仰上,当此之时,守威定功,安危之本在于此矣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,行自奋之智,不信功臣,不亲士民,废王道,立私权,禁文书而酷刑法,先诈力而后仁义,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诈力,安定者贵顺权,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。秦离战国而王天下,其道不易,其政不改,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。孤独而有之,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,并殷周之迹,以制御其政,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,名号显美,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,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。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,天下之嗷嗷,新主之资也。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,而任忠贤,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,缟素而正先帝之过,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,建国立君以礼天下,虚囹圄而免刑戮,除去收帑污秽之罪,使各反其乡里,发仓廩,散财币,以振孤独穷困之士,轻赋少事,以佐百姓之急,约法省刑以持其后,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,更节修行,各慎其身,塞万民之望,而以威德与天下,天下集矣。即四海之内,皆讙然各自安乐其处,唯恐有变,虽有狡猾之民,无离上之心,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,而暴乱之奸止矣。二世不行此术,而重之以无道,坏宗庙与民,更始作阿房宫,繁刑严诛,吏治刻深,赏罚不当,赋敛无度,天下多事,吏弗能纪,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,而上下相遁,蒙罪者众,刑戮相望于道,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,人怀自危之心,亲处穷苦之实,咸不安其位,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,不藉公侯之尊,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,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见始终之变,知存亡之机,是以牧民之道,务在安之而已。天下虽有逆行之臣,必无响应之助矣。故曰:安民可与行义,而危民易与为非,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身不免于戮杀者,正倾非也。是二世之过也。<sup>①</sup>

通常的看法,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引《过秦论》止于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。“秦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”句下,裴骃《集解》引徐广曰:“一本有此篇,无前者‘秦孝公’已下,而又以‘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’继此末也。”<sup>②</sup>说明徐广所见,自“秦并海内,兼诸侯,南面称帝,以养四海”起,至“是二世之过也”止,为《过秦论》的另一篇,或曰下篇,讲二世之过。从“襄公立,享国十二年。初为西峙。葬西垂”起,又为司马迁语。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曰:“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处,皆当据秦纪为说,与正史小有不同,今取异说重列于后。”<sup>③</sup>所见尤是。

(二)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所引《过秦论》称为“贾生言”,当为《过秦论》之中篇,在“陈胜虽已死,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,由涉首事也。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,至今血食”<sup>④</sup>下所载“褚先生曰:地形险阻,所以为固也;兵革刑法,所以为治也。犹未足恃也。夫先王以仁义为本,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,岂不然哉!吾闻贾生之称曰”<sup>⑤</sup>之后,其文曰: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,以窥周室。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备;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,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蒙故业,因遗策,南取汉中,西举巴蜀,东割膏腴之地,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,会盟而谋弱秦。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,以致天下之士。合从缔交,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,皆明知而忠信,宽厚而爱人,尊贤而重士。约从连衡,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

①②③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6《秦始皇本纪》,第349—358,356,358页。

④⑤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48《陈涉世家》,第2378,2379页。

谋,齐明、周聚、陈轸、邵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,吴起、孙臆、带他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什倍之地,百万之师,仰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而延敌,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固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,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,追亡逐北,伏尸百万,流血漂橹,因利乘便,宰割天下,分裂山河,强国请服,弱国入朝。

施及孝文王、庄襄王,享国之日浅,国家无事。

及至始皇,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敲朴以鞭笞天下,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,百越之君俛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,燔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。堕名城,杀豪俊,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,销锋鋌,铸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,因河为池,据亿丈之城,临不测之溪以为固。良将劲弩,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,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,始皇之心,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,余威振于殊俗。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,瓮隶之人,而迁徙之徒也。材能不及中人,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,陶朱、猗顿之富也。蹠足行伍之闲,俛仰仟佰之中,率罢散之卒,将数百之众,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,揭竿为旗,天下云会响应,赢粮而景从,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天下非小弱也;雍州之地,殽函之固自若也。陈涉之位,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;鉏耰棘矜,非铦于句戟长铙也;适戍之众,非侔于九国之师也;深谋远虑,行军用兵之道,非及乡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,功业相反也。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,比权量力,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而秦以区区之地,致万乘之权,抑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,殽函为宫。一夫作难而七庙堕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<sup>①</sup>

关于这里的引用,裴骃《史记集解》引徐广曰“一作‘太史公’。骃案:班固奏事云‘太史迁取贾谊《过秦》上下篇以为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陈涉世家》下赞文’,然则言‘褚先生’者,非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:“徐广与裴骃据所见别本及班彪奏事,皆云合作‘太史公’。今据此是褚先生述《史记》,加此赞首地形险阻数句,然后始称贾生之言,因即改太史公之目,而自题己位号也。已下义并已见始皇之本纪讫。”<sup>③</sup>

(三)《汉书》赞曰“昔贾生之过秦曰”云云与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相近: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而窥周室,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,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,商君佐之,内立法度,务耕织,修守战之备,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,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,因遗策,南取汉中,西举巴蜀,东割膏腴之地,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,会盟而谋弱秦,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,以致天下之士。合从缔交,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。此四贤者,皆明智而忠信,宽厚而爱人,尊贤重士,约从离横,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,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,吴起、孙臆、带他、儿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,百万之军,仰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,九国之师遁巡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,而天下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败,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,追亡逐北,伏尸百万,流血漂卤,因利乘便,宰割天下,分裂山河;强国请服,弱国入朝。施及孝文、庄襄王,享国之日浅,国家亡事。

及至始皇,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驭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敲朴以鞭笞天下,威震四海。南取百粤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粤之君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,焚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。堕名城,杀豪俊,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,销锋鋌铸以为金人十二,以弱天下之民。

①②③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48《陈涉世家》,第2379—2382,2379,2379页。

然后践华为城,因河为池,据亿丈之城,临不测之川,以为固。良将劲弩,守要害之处,信臣精卒,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,始皇之心,自以为关中之固,金城千里,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,余威震于殊俗。然而陈涉,瓮牖绳枢之子,氓隶之人,迁徙之徒也,材能不及中庸,非有仲尼、墨翟之知,陶朱、猗顿之富。蹑足行伍之间,而免起阡陌之中,帅罢散之卒,将数百之众,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,揭竿为旗,天下云合向应,赢粮而景从,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且天下非小弱也;雍州之地,殽函之固,自若也。陈涉之位,不齿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;鉏耰棘矜,不敌于钩戟长铍;适戍之众,不亢于九国之师;深谋远虑,行军用兵之道,非及曩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,功业相反,何也?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,比权量力,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,致万乘之权,招八州而朝同列,百有余年,然后以六合为家,殽函为宫。一夫作难而七庙隳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仁谊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<sup>①</sup>

以上所列三种不同的段落,除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所引第三段落外,皆见于贾谊《新书》,但是编排不一致。这说明,司马迁、班固所见贾谊传世文字,可能来源不一样。《汉书》所引《过秦论》,与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相近,但是文字略有不同。现在无法证实的是,《汉书》对《过秦论》的引用,不知是直接引自《史记》,还是引自《新书》。

今日所见《新书》,宋人朱熹、清人孙志祖、孙贻让等人认为,是经过刘向整理而成。但如果真是刘向整理,班固应当看过,何以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载贾谊《治安策》,《新书》中散见四五处,由此说明,这部《新书》可能班固也没有看过。但是《玉海》所载58篇名目,与今传完全一致。可能今传《新书》至少应当是班固以后的人整理的。后到什么时候呢?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儒家类“《贾子》十一卷。汉长沙王太傅洛阳贾谊撰。《汉志》五十八篇。今书首载《过秦论》,末为《吊湘赋》,余皆录《汉书》语,且略节谊本传于第十一卷。其非《汉书》所有者,辄浅薄不足观,决非谊本书也。”<sup>②</sup>王应麟晚于陈振孙,由此或可推断,《新书》应出现在陈振孙与王应麟之间。

我所以作上述说明,目的是探讨《文选》中所收《过秦论》的来源,可以肯定不是来自《新书》,而是来自《史记》或者《汉书》。我在从事《文选旧注辑存》工作中发现,凡《文选》收录作品同时见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篇章,其文字多与《汉书》相近,只是《汉书》多古字、异体字、假借字,《文选》多改为通行字。由此可以推断,《过秦论》应取自《汉书》。

## 二、《过秦论》“过”字内涵及其警示

《过秦论》的篇题,可能也有一个形成过程。《汉书·陈胜项籍传》应劭注曰“贾生书有《过秦》二篇,言秦之过。”<sup>③</sup>应劭认为是指秦之过错。当然,这里用作动词。由此来看,原本无“论”字,论字或为后人所题。《吴志·阚泽传》称此篇为《过秦论》,则魏晋时期已有此称。

那么,秦之“过”在何处?作者在开篇并没有直接说出,而是用赞赏的口吻先描述秦国的强大。作者分两层来写,一是写秦孝公的奠定之功,二是写秦始皇的统一大业。

先说第一个层面“秦孝公据肴函之固,拥雍州之地,君臣固守,以窥周室。”秦孝公于周显王七年,即公元前362年继立,时年21岁。《资治通鉴》卷2记载秦国之兴,即始于孝公,称“是时河、山以东强国六,淮、泗之间小国十余,楚、魏与秦接界。魏筑长城,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;楚自汉中,南有巴、黔中;皆以夷翟遇秦,摈斥之,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于是孝公发愤,布德修政,欲以强秦”<sup>④</sup>。第二年(公元前

① 班固《汉书》,第1821—1825页。

② 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270页。

③ 班固《汉书》卷31《陈胜项籍传》,第1821页。

④ 司马光等《资治通鉴》卷2,北京:中华书局,1956年,第43页。

361) 秦孝公下令 招纳贤人:“昔我穆公,自岐、雍之间修德行武,东平晋乱,以河为界,西霸戎翟,广地千里,天子致伯,诸侯毕贺,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会往者厉、躁、简公、出子之不宁,国家内忧,未遑外事,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,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,殽抚边境,徙治栎阳,且欲东伐,复穆公之故地,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,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,吾且尊官,与之分土。”<sup>①</sup>于是商鞅西入秦,推动变法:1.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、连坐;2. 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,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;3. 有军功者,各以率受上爵;4. 为私斗者,各以轻重被刑大小;5. 僇力本业,耕织致粟帛多者,复其身;6.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,举以为收孥;7. 宗室非有军功论,不得为属籍;8. 明尊卑爵秩等级,各以差次,名田宅、臣妾、衣服;9. 有功者显荣,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说,道不拾遗,山无盗贼,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,怯于私斗,乡邑大治。”<sup>②</sup>鞅函,又作“峭函”,指峭关和函谷关。雍州,在今陕西凤翔,秦国发力的地方。上世纪这里发现秦公大墓,规格极高,早已僭越。所以文称“有席卷天下,包举宇内,囊括四海之意,并吞八荒之心”,可谓写实。这个时期,秦国的内政是力推商鞅变法,重农轻商,外政则是合纵连横,为拓边战争而储备兵器。“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”谓轻松就取得西河之地。这时,秦国的野心就是面向中原。当时大国中,东齐、西秦、南楚,对中原形成合围之势。这时,如果与其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,形成纵向势力,齐、秦便无所作为。因此,很多有识之士早就看出这一点。公元前329年,楚威王卒,怀王立。这一年,魏人张仪入秦为相,倡导连横政策,主张秦、楚、齐这三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。而魏将公孙衍则推行合纵方略,发起魏、韩、赵、燕、中山等“五国相王”,抗击秦、楚、齐。在合纵联横的两大势力抗争中,楚国的态度至关重要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国形势的走向。故时人有“横则秦帝,纵则楚王”或“非秦而楚,非楚而秦”之说。秦、楚本为姻亲国,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通婚。两国的关系向来比较复杂,可以用又爱又恨来描述。就秦国方面来说,他们占有更多优势。譬如公元前316年,秦国乘乱攻占巴蜀,楚国失去可靠的大后方。《华阳国志》说“得蜀则得楚,楚亡,则天下并矣。”<sup>③</sup>同年,秦军东向,攻破赵、韩等地,魏、韩公开投入秦国怀抱。面对着这种不利局面,楚国内部也发生重要分歧。屈原力主联齐抗秦,楚怀王鉴于“秦之心欲伐楚”,赞同联齐主张,派遣“屈原为楚东使于齐,以结强党”。可惜,楚怀王没有把握住荣任“纵约长”的机会,致使秦国各个击破,使楚国逐渐处于更加不利地位。

占据西南之后,中原地区诸侯惊恐万状,合谋弱秦,合纵连横,成为当时的焦点。当时,战国四大公子,齐有孟尝,赵有平原,楚有春申,魏有信陵,纷纷招纳贤才,约纵离横。加之边界有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各个小国,又有谋士挑拨离间,聚集各自的力量。“尝以十倍之地,百万之众,叩关而攻秦。”而结果却是“秦人开关而延敌,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”。纵散约解,割地赂秦。此后,秦国日益强大,为统一中国做好了各个方面的准备。

再看第二个层面“及至秦王,续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椎拊以鞭笞天下,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越之君,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”六世余烈,至秦孝公、惠文王、武王、昭王、孝文王到庄襄王。“振长策而御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。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敲扑以鞭笞天下。”长策,长鞭。敲扑,《秦始皇本纪》作“捶拊”<sup>④</sup>。《项羽本纪》作“敲朴”。《史记集解》徐广所见为“槁朴”<sup>⑤</sup>,《汉书》作“敲扑”<sup>⑥</sup>,都是敲打的意思。履至尊,为登基为始皇帝。此后,又平定岭南,建立边郡。“百越之君,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”百越,又作百粤。俯,即俯字。俯首称臣之意。至此,

①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5《秦本纪》第202页。

② 司马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第2712页。

③ 常璩《华阳国志校补图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126页。

④⑤ 司马迁《史记》卷7《项羽本纪》第280、281页。

⑥ 班固《汉书》卷31《项籍传》第1823页。

秦始皇已经完成了百代统一大业,功莫大焉。

作者意犹未尽,又继续写道,对外,秦始皇派蒙恬修筑万里长城。“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”对内,实行惠民政策,“废先王之道,燔百家之言,以愚黔首。”又收罗天下兵器,在咸阳熔铸十二金人。锋鋌,兵刃。然后以华山为天然屏障,以黄河作为城池。良将强兵把守关塞,可谓固若金汤,子孙万代繁衍。为此而自称始皇帝。在这段夸张描述中,有些是与史实有出入的。譬如灭二周,就是秦始皇祖上的业绩,如秦昭王五十一年灭西周,其后七年庄襄王灭东周,这里将功业都集中在秦始皇身上,其实是欲擒故纵,把好话说尽,就是为了和秦国的迅速崩溃作鲜明的对比。

“然而陈涉,瓮牖绳枢之子”数句,为转折之笔。瓮牖绳枢,即以绳系户枢,瓦瓮为窗,形容生活贫贱。眚隶之人,而迁徙之徒,形容地位卑下。眚,又作“氓”、“萌”,对人的贱称。就是这样一些无钱无权无地位的下贱之人,“蹠足行伍之间,俛起阡陌之中”。振臂一呼,天下云集,众生响应,如影随形,竟然一举推翻了强大的秦帝国。赢粮,担军粮。作者反问,按理说天下还是那个天下。雍州之地、殽函之固,也还是那样坚固。而论实力,陈胜、吴广等人远不能与六国相比。论兵力,陈胜等也远没有九国兵力之众。至于谋略,更是逊色于战国贤士。秦朝销毁兵器,那些农民只能“斩木为兵,揭竿为旗”。六国灭亡,而陈胜反而成功。“成败异变,功业相反。”再拿陈胜与秦国相比,秦国历经百年的奋斗,才打下天下。而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,身死人手,为天下笑者,何也?”

行文至此,由对秦国的颂扬,转为对其失败的反思。作者的回答是“仁义不施,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即不知道根据天下大势的变化而改变基本的治世方略。他认为,秦并六国,南面而王天下,是符合人民心愿的。经过长期分裂、战乱,疲敝不堪的广大人民,“冀得安其性命,莫不虚心而仰上”。这时统治者能否照顾人民的愿望和利益,是关系政权安危之所在。可是秦始皇仍以酷刑和暴政虐待治下的臣民,“故其亡可立而待”。这便是秦朝之“过”的核心所在。

如何避免这样的过失?贾谊在分析秦亡的教训中得出了“是以牧民之道,务在安之而已”的结论。就是说,统治者使百姓各安其处,百官各安其位,一句话,治国理民的办法,最重要的就在一个“安”字。

### 三、《过秦论》的意义及其影响

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,促使西汉初年的思想家进行深刻的反思。鉴于秦代苛政,西汉初年思想家主张无为而治。陆贾《新语》专辟《无为》一节。萧何制礼作乐,曹参紧随其后。《汉书·循吏传》也说“汉兴之初,反秦之敝,与民休息,凡事简易,禁罔疏阔,而相国萧、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,民作《画一》之歌。孝惠垂拱,高后女主,不出房闼,而天下晏然,民务稼穡,衣食滋殖。”<sup>①</sup>但是,这里所说的黄老之术,显然不仅仅是一种修身养性之术,而是一种权术。吕后之死,陈平与周勃一举击溃诸吕,就表现得非常明显。这说明,黄老之术也还是权宜之计。

汉文帝即位不久,就积极谋求发展之路。二年十一月,文帝作《日食求言诏》,举贤良方正及能直言极谏者。贾山为此而作《至言》,文章借秦为喻,言治乱之道,其宗旨与贾谊《过秦论》相近。与此同时,贾谊作《论积贮》。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家还有晁错等人,他们共同提出若干重要主张:第一,限定各地铸钱;第二,广开言路;第三,大规模徙边;第四,削夺地方权力;第五,重农轻商,囤积粮食。这些主张,为历史证明基本上是正确的,也为汉帝国的发展谋划了整体的蓝图。从这样的背景下看《过秦论》,其意义就会凸显出来。

从政治上说,《过秦论》的基本主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,强调劝农安民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:“文帝即位,躬修俭节,思安百姓。时民近战国,皆背本趋末,贾谊说上曰:‘管子曰:仓廩实而知礼节。民不足而

① 班固《汉书》卷89《循吏传》,第3623页。

可治者,自古及今,未之尝闻……’。于是,上感谊言,始开籍田,躬耕以劝百姓。”<sup>①</sup>按文中有“汉之为汉,凡四十年矣”之语,刘邦为汉王在公元前206年,至文帝二年,凡39年。另外,他秉承荀子的学说,不遗余力地弘扬传统的仁义礼乐,与申、商判然有别。《荀子》说“在天者莫明于日月,在地者莫明于水火,在物者莫明于珠玉,在人者莫明于礼义。”<sup>②</sup>贾谊生活在秦汉转型之际,强调以“仁义”治天下。所以刘熙载《艺概》说“贾生、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。若论其实,惟象山最说得好:‘贾谊是就事实上说仁义,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’。”<sup>③</sup>当然,这里所说的“仁义”也不无刑名权术的成分。文帝起于民间,深知稳定当时社会的主要方略应当是黄老无为之学。而贾谊的主张,在文帝看来不一定尽合时宜。但是历史发展充分证明贾谊的主张多有相当的超前性。

从学术上说,贾谊师从张苍学《左传》。而据许慎《说文解字后序》,张苍也传荀子之学。因此,贾谊可谓荀子的再传弟子。张苍为律学大师,是汉初重臣中最有学问的人,百家之说,无所不观,无所不通,著书18篇,涉猎颇广,在汉初文化方面影响颇为深远。因此,贾谊的学术传承与荀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而荀子之儒学,与孟子不同,如果说孟子学说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的话,那么荀子学说则更多地涂抹了经世致用的色彩。因此,荀子的学说就易于为后世各取所需而分道扬镳。根据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等传记材料记载,文帝时代,天下众书丛出,皆诸子传说,广立学官,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皆置博士,多达70余人。后来又置传记博士,独立五经而已。这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,贾谊奋发扬厉,在政论文章中反复征引礼经,推阐新制,如《新书·辅佐》论述大相、大拂、大辅、道行、调谏、典方、奉常、祧师的职责,既非周制,也非汉制,很可能是贾谊自己制定出来的。又有《礼》篇,称“道德仁义,非礼不成;教训正俗,非礼不备;分争辩讼,非礼不决;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,非礼不定;宦学事师,非礼不亲;班朝治军、莅官行法,非礼威严不行;祷祠祭祀,供给鬼神,非礼不诚不庄。是以君子恭敬、撝节、退让以明礼。”<sup>④</sup>此外有《容经》,以《洪范》五事为纲,即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,又以《周礼》保氏六仪为纬,即祭祀之容,宾客之容,朝廷之容,丧纪之容,军旅之容,车马之容,规定得非常详尽。其中一些文字与《大戴礼》中的《傅职》、《保傅》、《连语》、《辅佐》、《胎教》等多有重合。《礼记》中也有若干文字和条目见于《新书》。我们无法确切地分辨这是贾谊抄自《礼记》等书,还是这些书的编者取材于贾谊著作,抑或他们均本于先秦典籍,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,即贾谊的思想特立独行,在汉初的思想界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。正因为如此,刘歆说“在汉朝之儒,惟贾生而已。”

若干年前,我曾撰写《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》<sup>⑤</sup>、《贾谊所见书蠹测》<sup>⑥</sup>等文,专门探讨贾谊的学术背景与文学风格形成的相互关系,认为贾谊的文章风格与李斯相近,都受到了荀子的影响。贾谊师承链条中还有一个推荐他出仕的吴公。他是李斯的学生,又同郡,属长蔡人。由此来看,不论是张苍,还是吴公,均传荀子之学。李斯的《谏逐客书》层层递进,由远及近,从秦缪公求士写起,写到秦孝公用商鞅,秦惠公用张仪,秦昭王用范雎等,反复阐述了客卿游秦给国家带来的各种好处,如秦孝公用商鞅,“移风易俗,民以殷盛,国以富强”<sup>⑦</sup>。秦惠王用张仪,“拔三川之地,西并巴蜀,北收上郡,南取汉中”。所有这些,“客何负于秦哉!”在文章的最后,作者尖锐地指出,倘若此时逐客,正中其他诸侯国的下怀,既给百姓带来损害,又会增加人们对秦国的仇恨,结果“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,求国无危,不可得也”<sup>⑦</sup>。文章列举事实,严密推理,晓以利害,动以情理,深深打动了秦王,于是收回逐客令,恢复李斯的官位。贾谊的《过秦论》也有类似的笔法,高屋建瓴,历数史实,层层推理,辨难析疑。尤其是开篇,用排

① 班固《汉书》卷24上《食货志》,第1127—1130页。

② 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8年,第316页。

③ 刘熙载撰,袁津琥校注《艺概注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9年,第99页。

④ 贾谊撰,阎振益、钟夏校注《新书校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,2000年,第214页。

⑤ 跃进《贾谊的学术背景及其文章风格的形成》,《文史哲》2006年第2期。

⑥ 跃进《贾谊所见书蠹测》,《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2008年第4期。

⑦⑦ 李斯《谏逐客书》,见萧统编,李善注《文选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6年,第1756,1758页。

比的句式写来,气势磅礴,雄浑高远,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。这种风格,可能与他们同传《左传》有关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论述文与质的关系,认为“言以足志,文以足言”,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。贾谊的文章首先以气胜,像“奋六世之余烈,振长策而驭宇内,吞二周而亡诸侯,履至尊而制六合,执敲扑以鞭笞天下,威震四海。南取百粤之地,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粤之君俯首系颈,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,却匈奴七百余里,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”,写得文采飞扬,起到了惊听回视的艺术效果。《陈政事疏》是一些奏章的集合体,论及许多问题,似是多篇奏章的精华所在。《秦汉文钞》引黄贞甫曰“通国体,入人情,药石薏龟,莫喻其当,文章层迭驰骤,古桀深爽。原本经术,纵横策士之风,令贤良醉心,茂才短气,真千古书疏之冠。”<sup>①</sup>《汉文归》引林希元评“贾谊所言皆三代秦汉之事,先王典故,可以概见。真有补于治道。先儒谓通达国体,信矣。看其词气,多是矢口成言,殊不费力,盖其时去古未远,其文字于苏秦、蔡泽、韩信、蒯彻立谈游说语相仿佛。要不可以书生操觚缀文论也。”<sup>②</sup>这些都指出其文章的深刻针对性,同时又具有高超的艺术性。

《文选》卷52所收曹冏《六代论》则完全受此影响。《晋书·曹志传》载,《六代论》相传是曹植所作。曹植的孙子曹志查阅曹植亲自撰写的著述目录,并5此篇,回答晋武帝的询问说“以臣所闻,是臣族父冏所作。以先王文高名著,欲令书传于后,是以假托。”<sup>③</sup>《魏志》卷20《武文世王公传》裴注引《魏氏春秋》载宗室曹冏上书,其文论前有序一段,《文选》所录则无。正论部分全文载入。《六代论》前序曰:

臣闻古之王者,必建同姓以明亲亲,必树异姓以明贤贤。故传曰“庸勋亲亲,昵近尊贤”;《书》曰“克明俊德,以亲九族”;《诗》云“怀德维宁,宗子维城。”由是观之,非贤无与兴功,非亲无与辅治。夫亲亲之道,专用则其渐也微弱。贤贤之道,偏任则其弊也劫夺。先圣知其然也,故博求亲疏而并用之,近则有宗盟藩卫之固,远则有仁贤辅弼之助,盛则有与其共治,衰则有与其守其土,安则有与其享其福,危则有与其同其祸。夫然,故能有其国家,保其社稷,历纪长久,本枝百世也。今魏尊尊之法虽明,亲亲之道未备。《诗》不云乎,“鹒鹒在原,兄弟急难”。以斯言之,明兄弟相救于丧乱之际,同心于忧祸之间,虽有阂墙之忿,不忘御侮之事。何则?忧患同也。今则不然。或任而不重,或释而不任,一旦疆场称警,关门反拒,股肱不扶,膂心无卫。臣窃惟此,寝不安席,思献丹诚,贡策朱阙。谨撰合所闻,叙论成败。<sup>④</sup>

此文又载于《艺文类聚》卷11《帝王部》。黄侃《文选平点》卷6谓“此文最善效《过秦》,殆非子建不办。”<sup>⑤</sup>亦推测为曹植所作。而文中有“大魏之兴,于今二十有四年矣”。以曹丕登基的黄初元年推断,此文之作当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四年(243),而曹植已在十年前离世。因此,断为曹冏所作。曹冏,字符首,少帝完齐王曹芳族祖。当时,曹芳幼稚,曹冏作此论奉劝曹爽,希望他能接受历史教训。六代,指夏、殷、周、秦、汉、魏。作者从两个维度比较六代兴衰,一是六代兴替的比较,一是朝内兴衰的比较。所以文章的开篇就提出问题“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,而秦二世而亡。”夏自禹以至于桀,十七王。殷商为天子二十余世,周为天子三十余世,为什么秦二世而亡?结论是,兴盛王朝的君主“与天下共其民,故天下同其忧。秦王独制其民,故倾危而莫救”。与天下共其民,就是与其同安乐,共治之。这与《过秦论》所说“牧民之道,务在安之而已”,乃同一意思。这个结论可以贯穿于六代兴衰的始终。但是,仅有一个“安”字,也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。

夏商周之衰败,“王纲弛而复张,诸侯傲而复肃”,而秦之兴,看到了周朝的弊端,于是“废五等之爵,立郡县之官。弃礼乐之教,任苛刻之政”。以为依靠关中之固和高压苛政,便可以金城千里,子孙万代,

① 闵迈德等编《秦汉文钞》,明万历四十八年吴兴闵氏朱墨套印本,1620年,第52页。

② 钟惺辑评《汉文归》,《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》第43册,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05年,第49页。

③ 房玄龄《晋书》卷50《曹志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390页。

④ 陈寿《三国志》卷19《魏书·曹志传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1年,第592页。

⑤ 黄侃《文选平点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年,第302页。

却没有想到二世而亡。汉鉴秦失,封植子弟,又有尾大不掉之弊;景帝削黜诸侯,诱发吴楚七国之乱;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,强化中央集团,却没有想到西汉后期大权旁落,外戚当政。东汉又进入另外怪圈,即外戚和宦官的矛盾伴随始终,又引发王权与士人的尖锐对立。魏武帝接受东汉的教训,努力吸引士人辅政,结果王室空虚。“内无深根不拔之固,外无盘石宗盟之助,非所以安社稷、为万代之业也。”当作者这样说的时候,正是曹爽、司马懿辅政的正始年间。“譬之种树,久则深固其根本,茂盛其枝叶。”曹叡希望曹爽要培植根基,“安而不逸,以虑危也。存而设备,以惧亡也。故疾风卒至,而无摧拔之忧。天下有变,而无倾危之患矣”。不幸的是6年之后的正始十年,一切都被曹叡言中。曹爽带着小皇帝到高平陵祭奠明帝,司马懿在京城政变,一举端掉曹爽的全班人马,天下巨变,曹魏政权从此败落。

但是司马氏也不能摆脱历史轮回的命运。干宝面对着短暂的西晋历史,在《晋纪·总论》中也用了《过秦论》的笔法说:

于时天下非暂弱也,军旅非无素也。彼刘渊者,离石之将兵都尉。王弥者,青州之散吏也。盖皆弓马之士,驱走之人,凡庸之才,非有吴先主诸葛孔明之能也。新起之寇,乌合之众,非吴蜀之敌也。脱耒为兵,裂裳为旗,非战国之器也。自下逆上,非邻国之势也。然而成败异效,抗天下如驱群羊,举二都如拾遗。将相侯王,连头受戮,乞为奴仆而犹不获。后嫔妃主,虜辱于戎卒,岂不哀哉!<sup>①</sup>

我曾撰写《弥纶群言,研精一理——班固与干宝的史论》一文(待发),特别指出晋武帝励精图治,政治内外,颇见功效,当时国力已经积淀一些实力这样一个事实。刘渊、王弥不过是地方小吏,论智力,并无诸葛亮那样的才能;论实力,起兵闹事,也不过是乌合之众,拿起农具作兵器,撕裂衣裳作旗帜,并没有东吴巴蜀的军事实力。也没有战国时期的号召力。他们自下反叛,也没有邻国的支持,但是却成功地驱使天下如驱群羊,攻破大都如拾草芥,历史为此翻开新的一页。过秦、过魏、过晋,一代一代之过,周而复始,不绝如缕,历史又总是在一个新的层面重复着过去的故事。

【责任编辑:张慕华;责任校对:张慕华,李青果】

<sup>①</sup> 房玄龄《晋书》卷5《愍帝纪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4年,第134页。